

夏濟安選集

夏濟安

序 陳  
跋 夏  
志 清

新潮叢書之六

葉 瑰 林衡哲主編 新潮叢書之六

# 夏濟安選集

夏濟安

夏濟安選集  
新潮叢書之六

---

著 作 者 夏 濟 安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273號  
郵 政 號 櫃 六 一 六 三 號  
總 經 銷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273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  
四 版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

**定價60元** 志文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 序

陳世驥

夏濟安先生的遺著，收成這本集子，作新潮叢書之一，到出版時，當正是濟安去世的六週年。提筆作序，難免又追懷傷逝。但是對於無論濟安的友好，或是他的新舊讀者來說，其紀念性不只是屬於適逢際會，或只又六年一度的悼念。濟安遺著，列入這新「新潮」，是有長遠、廣大、深厚的意義的。而且我們更企望它不斷有長遠、廣大、深厚的影響。

「新潮」在這裏的意義，照叢書弁言來理解，已經和上一代所素稱者不同，不是如以前，多只意味着「西潮」的東侵，而是因為「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看這裏收集起來的濟安遺著，正是在近二十年來中西文化的新撞擊中，艱苦產生極富建設性的成果。而且雖然是小小的一冊，其著作本身和所發生過的影響，正是意味着，如這裏「新潮」所抱負的，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如此，這部書，正是立在這裏所謂「新潮」的主流中。

這些文章看來都屬於文學批評創作的，但深遠處暗示着作者對現時中國文明的關心。他絕無一句空洞的口號，篇篇都是談具體的。甚至技術的問題，關係文藝、文字，以至文學修養和教育。但是他對文學的批判、建議、企望以至貢獻，反映着他對這一時代中國文明的批判、建議、企望，和貢獻。這種現象在中外古近歷史的某階段上是頗有前例的。文藝的創作批評，總必是具體的微言，但出於斯人斯地，以不離本行的話說出，却有了廣泛的大義。而這種現象常是發生在歷史轉捩的苦難階段，產

生於特有才具，身心經歷這苦難，對文藝有豐富的經驗，深入的體會，而又有相當超脫的智慧的人。而此人此文又常是在幾種文化的新撞擊下屹立起來的。

最明顯的近代西洋例證，如艾略特（T. S. Eliot）的創作和批評的巨大成績，出現於第一次大戰後艱苦的年月。而他是走出鄉土氣最重的美國西部，帶着美國傳統新耶教氣味，廣泛接受歐洲古典和近代文化，而終至寄身異域，在文明撞擊下返入舊教的人。在我們中國古代文藝豐富，而專致力於文學研究批評的不多。但也有一個顯例，那就是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彥和了。看彥和此人此文，豈不也是出現在文明一度支離破碎，人嘆世義道喪六朝到唐復興的轉捩點。劉勰的偉著，也只是最具體的深入文學本身，校練宗旨，詳析技巧，決無似前代清談的浮掠以充瀟洒，更決無空洞的口號或說教。但全部不獨反映，而且可說加強、開闢、並重建了中國人文的文明境界，且賦與新的意義。我嘗竊以爲直等到文心雕龍，過去的「道」字，那個傳統文明的標號，一切文史哲的口頭語，已漸常熟極不察，而非玄則濫，到此才又有一度新的充實和詣旨。從「文之爲德大矣，」到「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提高了文，同時也充實了「道」。而且「自然」也不再流於空洞玄虛，而有了具體自然界的意象，成了「日月疊璧，山川綺煥，」龍瑞豹姿，林籟泉韻。這是一位專心舞香文藝的人，在某一定的時代，由文藝的具體性，深入觀察，更有遠大眼光和智力來發揮，而對其當代的文明，在政論和橫議都顯虛脫無力的時候，奉給文明的無比貢獻。可是我們不會忘記，彥和之遭遇和親身感受的，也是一度中外文化的大撞擊，那就是盡人皆知，傳記明載的他那切身的沙門經驗。那就是，再套一句「弁言」的話，從「印度潮」以梵理多年拍打着遠東古中國陸地，到梁武帝幾度不惜捨身的時代。

當時的「佛潮」和近代初期的「西潮」自然是內容和進入方式都大不相同，而若只就政教功利方面說，也都大可任意褒貶，不過將今比昔，至少有一點是大可比擬的。即「佛潮」到彥和時代已不是初來的「狂浪拍打」或被盲目的崇拜，或被頑強的擠斥，而其真諦已漸熟悉，被消化，被吸收，漸溶於本土哲理，化入智識界的氣氛。再加南朝雖然一時文藝創作不景氣，可是對文藝專門技巧的自覺性，承着曹丕陸機的先導，在眼看自身文明劫運時，更覺這「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的文藝，要深長思之，有無比的重要。但是有自覺，只口說重要還是無用的，到此便須幸而出生一個特有才具、有熱心、有遠大眼光能高瞻遠矚的人。他能在這文化大撞擊後的新氣氛中，回顧自己整個文學以及文明的傳統，而極有消化力的深知如何用外來借鑒，作自覺的批判和說明，這當時就是劉彥和了。他本人在幼年及在晚年之切近佛門，是史傳大書特書的。但是文心雕龍一書，體大思精，辨析精微，却很少談梵引釋的。這也許是他消化的太好了，只把釋門的思路辨才，用於中國文學的研索，而不著跡象。但恐怕更是因為這是中國有史第一部整個傳統文學的精研深索大融匯，所以力求精純不駁。

「佛潮」究竟和今日「西潮」不同，只限梵經佛典，一旦大量介入，最富人文精神的中國文學研究，不是顯得過份玄虛，便似戒律教條。而精湛的文學研究是最忌玄虛和教條的。所以我們再分析說，在我們的五六世紀時，「佛潮」東來以後，經過長期激盪拍打，其精諦與實驗價值，已漸熟悉而融入知識界的氣氛，這是和我們二十世紀後半，五十年代以來的所謂「西潮」新情況，多是相通的；其對當時文學研究的新啟發，以及暗示着由此而來的文化「互相建設」，由文學的新自覺，而「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這也是正可相比擬的。但是現時「西潮」的情況，和那古遠的「佛潮」，即

便在此意味上說，又大有不同。就是現時所謂西潮，由其結果引起的新「新潮」而論，只就文學研究而言，決不限於宗教，甚至可說絕少關於狹義的宗教。而在其他方面，比起文心雕龍時代，可就太多。能選擇借鑒的太多，甚至能直接引入對照以及消融的也太多了。所以文心雕龍在當時是僅成的碩果，甚至在形式表面上很少露出外來「佛潮」影響的形跡；而現時我們則可期望着繁多的成就，並且以我們所期待的新文學研究，「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時，我們的成就，不可能也不必要掩蓋這新潮與外來影響撞擊交溶的跡象。相反的，我們現在既自信是已經「相得」，乃無妨使之「益彰」。這種成就的前景，自從五十年代以來，我認為，並且有事實明證，濟安這雖是薄薄一本遺著內的文章，會是一個有力的發願。

我們自然不是把濟安其人其文，和所舉的中外古今兩個平行例證，來作整個的比類的。時間、環境，以及各種文化撞擊時所表現的特質，和可能的結果，都是不同的。何況他在更飄搖動盪的生活中，又是英年早逝！但是我們相信這新「新潮」的定義與期望，和歷史上平行例證對比而見相通，是不錯的；而我們說他是先站在這個新潮的主流中，說他是這個新階段幸而產生的一個人，這兩句話，我們也相信是在自由中國一片土上，近二十年來，嚴肅作文藝新創作新研究的人，所可明眼公認的。再者，說到新階段新潮內中西文化撞擊對中國文學進一步的建設性，而提出濟安的地位貢獻，我們決不是蔑視上一代。的確，中西貫通的前輩，和他們篤路藍縷以至今猶持續的成績，還都是昭昭可指的。但需要識的是濟安舊紀為中國新文學努力的時候，一方面國家的危難環境是空前的，一面五十年代以來國際文化關係的轉變大開放，當然就自由中國說，也是空前的。因此斯人之出，既可說極難能，又

可說好際遇，而終是有他特殊的可貴。

這部遺著內的文章，大概是已經多人讀過的，自然無須再詳為介紹。但合起來再看，關於其中幾篇，我覺得有點個人的意思可說，那就是我所了解的濟安之著作態度。幾篇文章內常常出現的，他自己一句話「同情的批評」正是他的真正態度而身體力行的。這句話看來太平常，而且常常說，人人說，不但文學家說，中外政客，黨派競選，更是最常說。但真正能作到的實在太少，因此這句話的真正意義也就失掉了。可是只有真能做到的人才配說，才能真了解這話的意義。我們可以從濟安的幾篇文章內，看他真的身體力行，使我們恢復對這句話真正意義的了解。我們看他評彭歌「落月」的文章，看他論現代散文和詩，看他論西洋文學和文化，再看他評中國舊文化與新文學，處處可以體驗「同情的批評」這句話的字字原意、本意、真意，即實際應有的意義，和做到以後真可寶貴的價值，並且更重要的是看到這句話的積極性。旁人一般說慣，大概只作消極的理解：「同情」變成多只是原諒或可憐什麼不幸；「批評」只在是挑錯誤。於是「同情的批評」實用起來成爲「原諒錯誤」的聲明或請求。爲之者自示寬大，受之者謝您高抬貴手。用於政治，歸爲妥協；用於文藝，落得旁敲側擊之後做個好好先生。但濟安在這些文章裏的「同情的批評」，一反這些俗意。他的「同情」真是同鳴共感，而深入的參與到主題對象以內；他的批評真是由排比辨析（批字原意之）直作到持平的評，更又平穩的、積極的向前推進。從他這最平常的一句話；都運用到本意真詮，就可見其爲文之不苟；從他的言行之有力，更見其爲人之摯切，而富於愛的智慧。

試看他評彭歌先生的「落月」一文，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內，深愛着作者的主題和用

意，如共同追求一個理想的伴侶，爲他計劃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豐足完美的達到目的。他像比作者自己還着急、熱切。所以他的卓越見解，淵博知識，一點也不顯着是自己炫耀。這樣無私無我，才是真正的同情。他的指摘、辨析，無處不是精細的實例，平心對比衡量而求具體改善或發明，這才是真正的批評。他論現代散文，網羅他所有的切身經驗和觀察，批評處句句切中時弊，但又指出集合古典今言，俗語土話和舶來譯語之大總匯，如何用到好處，力須棄浮去濫，可以使我們的散文更豐富多能。他在這裏不是在評論某一個人的作品，而是客觀論列一般的現象，但是話儘管說的犀利俏皮，却決沒有置身事外的風涼意，而處處是在關心的負責。

他論新詩的文學是最謙虛的，寫時他大概還只有過一年實地留美的經驗，但介紹進的西洋理論，正都是現代美國在世界文藝會起領導作用的，所謂「新批評」的精髓。他自己絕少作新詩，但由於他特有的積極「同情」能力，他深入的體會到作新詩的甘苦，他又決不甘於重複浮濫玄虛的話，如「靈魂、心、敏感」來說詩，而特別提出詩人「還需要一副供制衡、選擇、判別、組織之用的頭腦。」他鼓勵，同時加警戒。他介紹西洋理論精華，可謂深透，但不但決不自炫，也決不只爲所介紹者令人耀眼。在介紹西洋進步的理論之後，他極聰明的加一篇介紹西洋的「兩首壞詩」，會是兩首享過盛名的詩，至今受現代批評的嚴厲指責，以證盛名之下未必無虛。標語、口號、膚淺蕪濫的感情表現，即使幸而混過一時，終被暴露。這樣「西詩之弊」，可同於「中詩之弊」，猶如另處他說我們的「今文之弊」，不少於「古文之弊」。這樣能持平而又加力向前推進的文藝評論基調，我認爲是五十年代以來「新潮」內，濟安在中國所能代表的特色。前一代的人未必都無此見解，但在「五四」後的一二階段

上・中西貫通的前輩，介紹西洋文藝，或討論今文，不會立此重點的。

這裏可以加一段插話。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冬，那時我和濟安還沒有見過面，他正在臺北預備出「文學雜誌」。胡適之先生正在加州柏克萊本校講學，濟安寫信給適之先生，託轉約我為他寫文章。適之先生的熱心援手是可以想像的，在旅館拿出信來給我看，並且叮囑。看濟安信上期望很大，想促起臺灣的新文藝創作，並且推進中國文學研究的理論。當時我隨便問：「寫點哪一類的文章好呢？」適之先生毫不猶豫的回答：「他們還是應該多翻譯些西洋名著看看，我已經寫信跟他說了，實秋先生也可以幫忙……」而且適之師，如其人，果然說到做到。記得接到「文學雜誌」的初幾期，看其中果然有胡先生的翻譯。我則是直到一九五八年才算第一次滿足了濟安的要求，而文章則是到臺北後小住，也許是沾染了那已漸開始的新「新潮」氣息罷，却寫的是論杜詩，略用西洋「新批評」的加重內析方法，但推及西洋近代某種對悲劇的精微理想，在其試驗的戲劇形式中並未成功，而在中國詩篇傑作，像「八陣圖」那樣精絕短章，倒確實體現了那種悲劇的精神。現在回想「文學雜誌」那最初幾年的歷史，由濟安的中堅活動，確然是集合了老、長、幼幾輩的共同努力。如果說大家都有點貢獻，也可以看出「重點」的漸漸不同，或就是引向新「新潮」的開始。

濟安的思想，可說寸步不離文學園地，甚至多於技巧處深入精微，其實文心雕龍豈不亦然？但如我們前頭所說，由平行例證可見，在一個歷史的新關鍵上，嚴肅熱誠的文學思想家，自然邏輯性的，由深入文學的考察，會具體提供由文學、文字，到文明和文化的考量。他論新詩，不只熱望新詩能狹義的把篇章技巧做到完美，而又提到文化的顧慮。但他決不大聲疾呼任何空洞口號，甚至也不能滿足

於像別人所說「我們寫詩……是將來整個一個傳統的奠基石」這一類話，而更進一步有警戒性的說到白話文和文化的問題：

我們且慢為白話文運動的成功覺得歡喜。假如白話文只有實用價值，假如白話文只為便於普及教育之用，白話文的成就非但是很有限的，而且將有日趨粗陋的可能……我們現在寫詩，是考驗白話文能不能「擔起重大的責任」，白話文能成爲「美」的文字。假如不能，白話文將證明是一種劣等文字；白話文既是大家寫作工具，那麼中國文化的前途也就大可憂慮了。

這段話我加了幾處圈引出，認為是所有關心中國文字、文化、教育的人和負責的人所應深思，看重新詩的地位、功用和指標；而同時更要自己作新詩的人三思又三思，了解如何能「擔起重大的責任」。

最後，既一再說到濟安對文字、文學，和文化的嚴重關聯，和他看到的路數，不得不略談一談他另一篇文章，「舊文化與新小說」。這是一篇題目最重，最容易引起困難的文章。我們要以濟安自己那種眞的「同情的批評」的精神去了解他這篇「同情的批評」。他的主旨是鼓勵我們的新文學作者，也努力汲取自己古文化的泉源。推到古遠終極，不能不提出孔孟之道。其在中國的傳統領導權威的地位，相當於西方宗教，雖然在本質，尤其是組織形式方面，大大的不同。他所謂「遜色」恐怕該說是這許多根本大不同的結果。既全不同，就無所謂眞的「優色」或「遜色」了。但既都同是有「教」的權威地位，無論中西，都自然而然演出傳統「教條」。久之，教條在人心目中就掩蓋了原來的哲理神

體。使原來活生生的語言和情操，都似僵化起來，令人望之生畏或疏遠，不能再使新的創造想像力與之易起共鳴。固然正面的提倡「教義」或「道旨」，加以新解卓見的諸公，不乏可佩的努力。但是更可以了解，如何使文學新的創作想像力，衝開教條藩籬，而再與這自己古文化泉源同鳴共感的結合起來，不是觀念的復古，而是想像創作的培新，在今日文學與文明的艱苦大掙扎的關鍵上，是非常值得提出鼓勵的。其中困難很多，更非攘臂大呼所能濟事。

濟安這篇文章極力避免口號，絕非說教口吻。只是把孔孟的話，儘量回復到活生生的語言來理解，而套入現代文學技巧看法，引作家走入試試，不要怕這已是聖人之「道」而生畏，或聽某些人說憤而生厭，却要憑自己以新肝膽相見去了解，生「同情」共鳴，去求新的開發和弘闊，融入文學各種形式的想像創造。文學史上提出聖人之道以領導創作的，說「載道」、「明道」、「貫道」，或「衛道」，怕是都已太聽熟而厭習了。而且既使我們嚴肅的考慮這些提議，用在文學創作理論上，至少以我們今人之見看來，覺得都大有偏差：「載道」豈不意味着「道」只是文學的負擔，束縛想像？「明道」成了明使文學說教，「貫道」更是暗示着勉強，極拘束的局限性，而「衛道」更是先認敗仗，色厲內荏者的口吻。但是既說到此處，我們如果還是願回顧而直視這個問題，又不能不為簡單扼要，還用這個「道」字作標號，為了回啜遠祖文化泉源，而弘闊自己新想像創造境界，倒似可翻新回引孔子自己一句關於「道」的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我們之為現代人，以我們活生生的想像創造力，回念當時孔孟老莊之活生生的想像創造和他們的活語言。如果這些語言是「道」，則不可畏，不須避，而在各形式的文學創造中，以我們現代人廣闊的境界，默化潛移，也許可以說我們現代人還是能

以文兼「弘道」吧——只要我們不忘了「弘道」上面兩個字是「人能」作條件。人只是我們自己，憑想像創造，不是受別人的教令，更不是權威的脅迫。

為什麼直到最近，耶教的聖經故事在西洋，如希臘的卡贊查基思，還能創出小說鉅著。而中國古典不能？這不是正統虔誠問題。卡氏的小說決不代表耶教正統，而在他能把基督造成活生生的現代意念形象，好像和現代人的善惡迷惘，愛慾困擾，和獨往的精神之可貴，更錯綜複雜的打成一片，而成爲一個嶄新角度的想像創作。自然，耶教籠罩下的全歐西文化是非常多元的、繁複的，所以常可以有新的撞擊，發生新的角度，激勵新的創作。我們因此希望「新潮」所承認的新的文化「撞擊」中，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更站起來，也產生無數的新角度，汲取多種源泉，包括古典文化，甚至「教」和

「道」在內。果然，則濟安這篇文章，也更是有發軔的力量了。

匆忙趕完此序，寒夜孤燈，不知濟安地下領笑否。手撫稿頁，覺得他遺著的一部份這薄薄一冊，却會使善讀者感到重大的精神份量。他的透闢見解，雋永筆鋒，又會令人讀着時而驚喜。但他終是像有許多重要話，尚未說完，便突然離去了。如他的同姓，清初烈士夏完淳的一句詩，「千古文章未盡才」，思之悽然。但念及說他是這「新潮」的發軔力量實有重重明證，展望前景其所能啟發的無盡人才，總是不禁又想起他生前常說的一句話，「快樂的啊。」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夜完稿

## 新潮弁言

我們想提供的並不是駭人聽聞的新事。在現在這個時候，所謂「新潮」，強調的是態度；我們想提供的是對文化與社會的新的勇敢介入的態度。

「新潮叢書」本着「新潮文庫」已經樹立的方針做表達技術方面的修改：我們希望這是一套完全由國人動手著述的好書，而不是亦步亦趨的翻譯品。我們要採印各種文化課目裡一流的中文著作，不論是文學藝術，哲學歷史，自然科學的現代底探討和回顧都是「新潮叢書」所試圖包容的課目。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廣泛而深入地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追求和思維的部份歷程，為你提供一種方法來面對當前形形色色的問題。

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着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來說，「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這是從「文庫」的翻譯到「叢書」的創作所願意推展的基礎意義。

這套「新潮叢書」的對象是國內外渴求新知的讀書人。我們的野心是讓大家肯定這一代的文藝界和學術界是在不斷推進的；我們相信，除了譯介西方的作品，我們這一代的智識界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東西來。

目  
錄

序

·陳序

第一輯：文學評論

第二輯：小說與詩

- (一) 傳宗與接代 ..... 一五九  
(二) 蘇麻子的榮養 ..... 一七七  
(三) 火 ..... 一八一  
(四) 耶穌會教士的故事 ..... 一九三  
(五) 香港——一九五〇 ..... 二一九  
跋 ..... 夏志清 ..... 二二三

# 第一輯●文學評論

## (一) 舊文化與新小說

中國當代思想界中，有新儒家一派。代表人物爲梁漱溟、錢賓西、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諸位先生。他們的思想與本文題旨無關，這裏不想介紹。但是他們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想建立以孔孟倫理思想爲中心的道德秩序；在功利主義潮流之下，重新標榜「重義輕利」的觀念；在集體主義（不論是蘇聯式的強制服從或是美國式的一窩蜂盲從）支配人心的時候，強調個人人格的尊嚴；這種努力是值得我們讚揚的。

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這種運動已經成功到什麼程度。成功，或者說是「深入人心」。據我們的觀察是很不幸的，這種運動可以說並不怎麼成功。儘管政府當局提倡讀經尊孔，大中學生中，接受儒家思想以孔孟的道德理想爲立身楷模的人並不多。學生的家長們，大多也以迎頭趕上時代爲榮，守舊落後爲恥。我們的觀察並沒有社會學的統計數字爲根據，所以並不精確。老實說，因爲我們同情新儒家運動，我們寧可我們的觀察是錯誤的。但是「不計成敗」本是儒家基本信條之一，社會現象之未能盡如人意，應該更能使這幾位大師發揚蹈厲，努力宣揚他們的主張。